

饒宗頤先生的生平、志節和學術考畧

鄭煒明 博士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高級研究員、副館長(學術)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

小引

近幾年以饒宗頤先生的方方面面為研究對象的「饒學」，漸次興起，但對饒先生的生平（特別是祖籍、師承和藏書）、志節（特別是抗戰時期的民族氣節和貫徹始終的民族文化情懷）和學風等問題，一向較少學者深入考論。筆者適逢其會，乃匆匆草撰此文以應，自知未臻完善，還祈方家不吝斧正。

甲、饒宗頤先生的祖籍、老師和藏書

（一）關於饒宗頤先生的祖籍

2002年，饒宗頤先生為梅縣松口銅琶村《饒氏族譜》題寫封面，之後在饒氏族中引起了有關饒先生祖籍究屬大埔茶陽抑或梅縣松口的熱烈討論。

其實，饒先生的祖籍為松口，這一點是無庸置疑的。饒先生的父親饒鏗先生民國九年（1920）編修《潮安饒氏家譜》，譜中早已明載：「吾宗遷潮近二百載」¹，又說：

吾饒氏自松口遷海陽及今近二百年，其先世舊不著，大抵力農孝弟世其

¹ 饒鏗：〈潮安饒氏家譜例言〉；見《饒鏗文集》之《天嘯樓集》拾遺卷·文，（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1月，第166頁。

家。²

案：潮安舊稱海陽。是以知饒氏在潮安的一支，饒先生的父親饒鏐先生在 1920 年修家譜前後，已確信並認定，其家「潮安饒氏」於二百年前（約在清初三代時）遷自梅縣松口。

有關饒先生祖籍歸屬的問題，饒氏族人意見分歧；究其根柢，只涉及梅縣松口饒氏一脈的開基始祖，是否出自大埔茶陽，抑是遷自福建。

在過去一段頗長的時間內，許多饒氏族人皆認為，松口饒氏的開基祖元貞公，乃出自大埔茶陽一脈，即饒氏大埔開基始祖四郎公的第四世第三子元貞。饒鏐先生當年也同樣持這個意見，其〈重修泗坑友溪公祠碑記〉云：

我饒氏自宋末四郎公由汀州遷潮之神泉，四傳至元貞公，當元之季始避兵程鄉，來家松口，其初卜居銅盤。³

案：神泉即今之大埔茶陽，程鄉即今之梅縣。其〈先大父少泉府君行狀〉又云：

宋末有四郎公者，隨父官汀州府推官，由閩入粵，而家於大埔，四傳至元貞公，更由大埔遷居嘉應松口之銅盤鄉，自後世居松口，至十二世祖任保府君，始徙來潮州之烏石寨。⁴

但最新的研究顯示，松口饒氏的開基始祖元貞公，又號二郎，應即饒氏濟宇公（於宋末曾任汀州推官，故又號汀州公）的第二子，宋末元初時由閩入粵，開基於梅州。而大埔開基始祖四郎公，亦源自汀州，乃是濟宇公的第四子，即松口的二郎元貞公的親弟。其他主要的論證還包括：⁵

1. 大埔茶陽《饒氏族譜》的第四世有兄弟三人，長名元亨，次名元利，三名元貞。元貞既是第三子，則不應號為二郎，此乃一大疑點，故疑此元貞當非松口饒氏的開基始祖元貞公。

² 饒鏐：〈家嚴慈六旬壽序略〉；見《饒鏐文集》之《天嘯樓集》拾遺卷·文，（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1月，第167頁。

³ 見《饒鏐文集》之《天嘯樓集》卷三；（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1月；第89頁。

⁴ 見《饒鏐文集》之《天嘯樓集》卷三；（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1月；第106頁。

⁵ 饒熙龍、饒達昌：〈梅縣松口銅琶村饒氏始祖考證〉；見客家文化時空論壇之客家研討 <http://www.kjwhsky.net/forum>，網絡上載日期及時間 2007-12-27 21:32。

2. 大埔茶陽《饒氏族譜》有關其第四世元貞的記載，僅有「遷移失稽」等聊聊數字，顯然大埔一脈對其第四世元貞的下落，並不了然。

筆者案：若松口一脈的元貞公果是大埔一脈第四世的元貞，何以大埔饒氏在清末之前數度修譜時，皆未加注錄，而僅謂「遷移失稽」？或大埔饒氏雖未知四郎公第四世元貞一支的下落，但當時卻仍清楚知道松口饒氏絕非該支，是以在修譜時僅簡單寫上「遷移失稽」等字。

3. 研究又發現，大埔第四世的元貞，其實是遷到了廣東連平縣李坑村開基，估計該支或因長居山區，路途險阻，終與大埔一脈失去聯繫。李坑村的饒氏族譜清楚列明，其開基祖乃遷自大埔茶陽的元貞。故可確證，饒氏元貞公有二，即分別為松口的開基祖和大埔的第四世第三子。

考閩粵饒氏，大抵皆源自其江西大始祖饒元亮，因第十九世饒季禮（字濟宇）赴任汀州推官而入閩，其四子開枝閩粵：一郎（名日素）開基於福建武平，二郎（名日奇）開基於廣東梅縣松口，三郎（名日隆）開基於福建龍岩，四郎（名日明）開基於廣東大埔茶陽。⁶ 而饒先生的遠祖，應是汀州公饒濟宇第二子饒日奇（二郎，元貞公）在梅縣松口開基所傳的一系。因此，說他祖籍松口，是正確無誤的；反而，如果說他祖籍大埔茶陽的話，則有錯認叔系為父系之虞。饒先生2002年為松口《饒氏族譜》題簽：「念二郎元貞公世系 饒氏族譜 選堂拜題」，看來確有認可該譜世系考訂之意。

本來認祖歸宗，是一人一家的私事，旁人不應置喙，更何況饒先生只是參考了父親饒鏗先生遺著中的線索，和尊重饒氏譜牒最新的研究和編訂成果而已。筆者不敏，近因饒學漸興，而饒氏族人中又頗有為饒先生祖籍而爭訟者，乃敢稍作平議，並誌崖略如上。

（二）關於饒宗頤先生的老師

以筆者追隨饒先生三十餘年所知所見，饒先生對曾教過自己的老師，常念念不忘，感恩戴德，多曾形諸文字，如其少年時的繪畫老師金陵楊棧先生⁷、引導饒先生學習北碑書法的父執蔡夢香先生⁸、中學一年級時的古文老師王慕韓先生

⁶ 參考饒新南：〈饒氏汀州公考略〉；饒新南 1122_新浪博客，2010-07-20 08:25:38。饒國鵬、饒和平：〈廣東大埔饒姓文化血脈的淵源與傳承〉；見中華饒氏網 <http://www.raoshi.cn/>，2014-4-2 21:46:43。

⁷ 參考饒宗頤：〈楊棧畫集序〉；見《楊棧畫集》，（香港）華夏文藝出版社，2004年2月；第3頁。

⁸ 參考饒宗頤：〈蔡夢香先生遺集引〉、〈蔡夢香先生墓志銘〉；見《固庵文錄》，（臺北）新文豐

⁹ 和國文老師丘玉麟先生¹⁰、古琴老師容心言先生¹¹、研習印度婆羅門教經典（Veda studies）和深造古梵文、《梨俱吠陀》時的老師老白春暉先生（Professor V. G. Paranjpe）和白春暉先生（V. V. Paranjpe）¹²、六十歲後學習古巴比倫文的老師蒲德侯先生（Professor Jean Bottéro）¹³ 等等，饒先生皆曾在相關的文章中，縷縷懷緬，崇敬有加。

近年盛傳饒先生兩位鄉前輩溫廷敬（丹銘）和陳光烈（梅湖），也是他的老師。這些說法嚴重失實，有必要加以辯正。

先說溫廷敬。溫廷敬（1869-1954），字丹銘，號止齋，早年筆名訥庵，晚年自稱堅白老人，廣東大埔縣人，1889年考獲秀才，1910年任教諭，授修職郎，曾於汕頭嶺東同文學堂掌教務，嶺東報社主持筆政，桂林廣西優級師範選科學堂掌教務並任教授等等；辛亥革命後出任惠潮嘉師範學校首任校長，其後歷任金山、回瀾等中學和國立廣東高等師範教席；1928年於汕頭籌設大埔縣修志局，任大埔縣續修新志總纂；1930年秋被委為廣東通志館總纂，後出任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主任；抗戰時期受制於敵偽；晚年患眼疾，生活困窘；著有《明季潮州忠逸傳》、《洛誥新解》、《舊五代史校補》、《金文疑年表》、《經史金文証補》、《金文正郭訂釋》、《廣東新志·廣東人物傳》（周至唐部分）、《金文疑年表續編》、《石鼓文證史訂釋》等等，編有《潮州詩萃》、《潮州文萃》等，另有論文和詩詞集多種。¹⁴

溫廷敬先生的兒子溫原，曾謂「一九四六年先父（溫廷敬）的學生饒宗頤等

出版公司，1989年9月臺1版；第275、357頁。

⁹ 參考饒宗頤、陳韓曦著：《選堂清談錄》，（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第6頁。另參饒宗頤：〈家學師承與自修〉；見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編：《走近饒宗頤》，潮州市政府出版，2005年8月第1版；第200-201頁。

¹⁰ 見郭偉川：〈略談選堂先生早年的經歷與學術機緣〉；《「饒宗頤教授學術研究論壇」會議論文冊》，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孫少文伉儷人文中國研究所主辦，2014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第51-52頁。有關丘玉麟（拉因）先生乃饒先生中學時國文老師一說，郭氏並未交代文獻依據，姑存此說以待考。饒先生曾為丘氏詩集撰序，見《回回紀事詩序》；《固庵文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9月臺1版；第278頁。

¹¹ 參考饒宗頤：〈琴府序〉；見《固庵文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9月臺1版；第301-302頁。

¹² 參考饒宗頤：〈梵學集小引〉；見《梵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目錄後第1頁。

¹³ 參考饒宗頤：〈近東開闢史詩〉；見《固庵文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9月臺1版；第28-29頁。

¹⁴ 參考溫原：〈溫丹銘先生生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汕頭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汕頭文史》第三輯，1986年3月，第102-116頁。

議修潮州新志，在汕頭民生路設立潮州修志館」。¹⁵ 但溫原此說未見提供任何證據。此外，黃挺先生又曾指饒先生「自己也師從溫先生，故溫先生稱他為『門下士』。……（饒）教授早年的學術，受溫先生影響很大。」¹⁶ 此說謂溫先生稱饒先生為門下士，亦未詳資料出處為何。¹⁷

溫先生是饒先生父親饒鏗先生就學於嶺東同文學堂時的老師。¹⁸ 其後，溫先生與饒鏗先生約有二十年沒有聯絡，至 1924 年，因饒鏗先生創辦《國故》月刊，向溫氏約稿並求覽《潮州詩萃》致書論學，才恢復來往，但不算很密切。¹⁹ 或因溫先生與饒鏗先生有師生關係，所以饒宗頤先生致書溫先生的時候，上款為「丹銘太夫子大人崇鑒（或侍右）」，而下款則自署「門下晚學生饒宗頤（或宗頤）」²⁰。筆者認為，上下款不應割裂而論；綜合兩者，則具見饒先生對溫氏執禮甚恭，但卻從未僭越輩份而直接稱謂溫氏為師，也沒有自稱為門人、學生、弟子、受業等等。饒先生自署「門下晚學生」，明顯是有意標出他與溫廷敬先生在輩份和關係上的差距，以示不敢擾亂，這其實是一種非常謙遜和謹慎的態度。至於饒先生的學術歷程，特別是早期，到底有多少受溫廷敬先生的影響，吾人可從此展開研究，一一細考，未遑遽定。總之，以饒先生為溫廷敬先生的門人或學生等等，似乎未盡準確；反之，溫先生並非饒先生的授業師，倒是十分明確的。

筆者認為，溫廷敬與饒先生的關係，應有下列四個層次：一、他曾是饒先生父親饒鏗的老師；二、他在廣東通志館與饒先生是上司與下屬²¹，饒先生乃溫

¹⁵ 溫原：〈溫丹銘先生生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汕頭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汕頭文史》第三輯，1986年3月，第112頁。

¹⁶ 黃挺：〈《饒宗頤潮汕地方史論集》編後〉；見《饒宗頤潮汕地方史論集》；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598頁。

¹⁷ 或即出自溫丹銘〈自述〉詩第六首「傾蓋都忘勢位尊」句之自注稱饒宗頤先生為「門下生」；見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汕頭市圖書館編，鄭煥隆點校：《溫丹銘先生詩文集》；（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6月第1版；第249頁。按：「門下生」一語，其義應即「門生」，不足以證明二人為師生關係；此語亦與饒先生向溫氏自稱「門下晚學生」之意相近。

¹⁸ 詳參溫丹銘：〈贈饒君純鈞並序〉；見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汕頭市圖書館編，鄭煥隆點校，《溫丹銘先生詩文集》；（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6月第1版；第151頁。

¹⁹ 詳參饒鏗：〈次韻丹銘先生見贈之作〉，《饒鏗文集》；（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1月；第177頁。另參饒鏗：〈覆溫丹銘先生書〉；見同書第70-73頁。

²⁰ 饒宗頤：〈與溫丹銘先生書〉；見黃挺編：《饒宗頤潮汕地方史論集》；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374-377頁。

²¹ 據檔案資料《國立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人員名冊》（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七日填），溫廷敬先生當時任纂修兼主任，饒先生任藝文纂修，二人住所俱報為廣東通志館；又據《國立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二十六年六月份薪水清冊》，主任溫廷敬薪額三〇〇元，纂修饒宗頤薪額一二〇元。上述兩份檔案俱藏於廣東省檔案館；照片見錄於廣州圖書館、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編：《萬古不磨意 中流自在心——饒宗頤教授學藝兼修展》圖冊；2007年4月；第9、10頁。

氏的助手²²；三、在學術上，他與饒先生是前輩與後輩²³；四、敘鄉情的話，他與饒先生是鄉前輩和晚輩（溫先生乃大埔人，大埔舊亦屬潮州）²⁴。因此，網上傳說溫廷敬是饒先生的「恩師」，這顯然是與事實不符的。

至於陳光烈（梅湖），與饒先生更沒有絲毫師生關係。有人刻意散播陳光烈（梅湖）乃饒先生「恩師」的謠言，但卻從來沒能提出過任何有力的真憑實據。據筆者研究所得，陳光烈（梅湖）與饒先生的關係，僅屬潮州同鄉，以及曾在抗日戰爭前一同於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內任職纂修的同事而已。²⁵

抗日戰爭時期，陳光烈（梅湖）曾為偽嶺東治安維持會籌備處創辦人、偽汕頭市政府秘書長、偽汕頭市警察局長、偽粵東綏靖督辦（節制粵東水陸軍警）、偽行政督察專員兼區保安司令、偽廣東高等法院東區分院院長等等，乃潮汕地區三大漢奸之一。在日本即將投降之前，陳光烈（梅湖）聞風化名潛逃至諸暨，或繼續從事秘密活動，解放前逃至香港，後曾居於日本。²⁶ 饒先生則於抗日戰爭時期，不停地逃避日寇和漢奸的統治，投奔後方（詳下文），與陳光烈（梅湖）沒有任何交集。在 1949 年之後，兩人先後移居香港，才偶有來往而已。而饒先生作為一位恪守本份的學者，也沒有因人廢言，曾於自己的目錄學著作中對陳光

²² 抗戰時期在潮汕地區奮戰抗日的將領、歷任饒平和揭陽縣長的陳暑木將軍，後來在〈饒宗頤與敦煌學〉（1983 年 12 月於泰國《新中原報》發表時，署名巽齋）一文中回憶說：「饒宗頤號稱神童，且又家學淵源，藏書豐富；其尊翁饒鏐，也是學者，著有《潮州藝文志》，為潮州的重要文獻。大埔溫廷敬，也（筆者按：疑脫是字）吾潮的歷史學家。丹銘（廷敬）翁執教廣州中山大學，曾為饒氏父子推報，且邀宗頤為其助手，以整理廣東文獻。故宗頤的對於歷史考據，早有聲名；而廷敬的失明，更顯其助手的才華。……」見陳炎創、陳炎慧、陳炎芳編：《陳暑木詩文選編》（修訂本）；澳門文化廣場有限公司出版，2009 年修訂第二版；第 95 頁。

²³ 據饒先生的〈與溫丹銘先生書〉三篇（注 19）看來，二人當時常有學術上的研討，內容以聲韻訓詁之學為主；從行文語氣來看，饒先生雖極尊崇溫老，但研討問題時，則似乎是各陳己見，互為參考，展現出一派平等論學的氣氛。

²⁴ 饒先生 16 歲作〈優曇花詩〉，引來比他年長 48 歲的溫丹銘先生賦詩〈廣優曇花詩並序〉以和。二人的詩作同刊於（廣州）《文學雜誌》1934 年第 11 期。具見溫老對饒先生這位門人之子、鄉晚輩的賞識和愛護。

²⁵ 據檔案資料《國立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人員名冊》（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七日填），陳梅湖當時任編纂，饒先生任藝文纂修，二人住所俱報為廣東通志館；又據《國立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二十六年六月份薪水清冊》，纂修陳梅湖薪額二〇〇元，纂修饒宗頤薪額一二〇元。上述兩份檔案俱藏於廣東省檔案館；照片見錄於廣州圖書館、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編：《萬古不磨意 中流自在心——饒宗頤教授學藝兼修展》圖冊；2007 年 4 月；第 9、10 頁。

²⁶ 詳參抗戰時期國民黨廣東省政府調查報告之〈廣東省政府呈行政院報告〉（1940 年 6 月 30 日）及〈廣東省奸偽動態調查專報〉（1940 年 11 月 1 日 粵統字第 20 號）；見張中華主編：《日本侵略廣東檔案史料選編》；（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5 年 8 月第 1 版；第 227 頁、第 241-275 頁。相關問題，筆者撰有論文〈一門兩代四漢奸——抗戰時期潮汕劣紳陳梅湖事蹟考略〉，待刊。

烈（梅湖）的方志著作，予以著錄，充分反映了饒先生在學術上的超然作風。²⁷

上文已經指出，饒先生從來不會隱瞞自己學問的淵源所自。他青少年時期在潮州，曾受業於其父饒鏜先生、楊棫先生、蔡夢香先生、王慕韓先生等等。這幾位都與陳光烈（梅湖）屬同時代、同輩份的人，若陳氏果曾教導過饒先生，何以饒先生後來在談及各方面的老師時，從來沒有提到過陳光烈（梅湖）？唯一合理的解釋是，陳氏根本就從來不是饒先生的老師。再根據網上流傳的未經鑒定的書信內容來看，饒先生對陳氏的稱謂，多只是「梅伯大人」或「世伯大人」，而自稱「世小侄宗頤」；至於陳氏則稱饒先生為「宗頤賢侄」、「世兄」等等。因此，他們不是師生關係，是顯而易見的。從彼此之間的稱謂來看，陳氏與饒先生最多僅是世交中的長輩和晚輩的關係，不涉其他。

退一萬步來說，即使饒先生曾於交往中，稱陳氏為「師」，也是不足為奇的。因為已有研究指出，在民國時期各省通志館中有一種習俗：年輕的纂修多會敬稱館內較年長的前輩為師。²⁸ 1935年饒先生應聘入廣東通志館任藝文纂修時只有19歲，而同為纂修的陳光烈（梅湖）則已51歲；按當時通志館的習俗，則饒先生或於日常交往中曾稱呼陳氏為師，但即便如此，也並不等同二人有真正的師生關係。

散播這個謠言的主要是陳光烈（梅湖）的後人，和一位自稱是陳氏逝世前所收的關門弟子盧某，他們此舉恐怕是想誤導公眾，別有用心。

（三）關於饒宗頤先生的藏書

粵東藏書，清季以來名氣最大的是豐順丁氏（丁日昌）持靜齋²⁹、潮安林氏（案即林熙春城南書屋）和朱氏（案即朱學勤結一廬）等三家。至民國時期，僅餘林氏；而朱氏藏書，大半歸饒先生父親饒鏜先生所藏，加上其他購藏，饒鏜先生的天嘯樓合計約有藏書六、七萬卷³⁰。饒氏天嘯樓藏書，在民國時期的潮汕地區，名氣最大；研究民國潮汕藏書樓的學者，多首稱饒氏天嘯樓。如鄭喜勝

²⁷ 詳參饒宗頤，《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善本書錄》；（香港）龍門書店，1970年12月初版；第133-134頁。

²⁸ 曾榮：〈民國通志館述略〉；見《中國地方志》期刊網·舊志研究欄。下載日期：27/10/2014。

²⁹ 有學者指出，晚清丁氏持靜齋藏書，名聞全國；曾與李盛鐸、朱學勤三者合稱咸豐三大藏書家；又與朱學勤的結一廬、長沙袁芳瑛的臥雪樓並稱海內三大藏書處；也有人將之與晚清的楊氏海源閣、瞿氏鐵琴銅劍樓相媲美。參閱本旭：〈潮汕歷代藏書樓述略〉；《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22卷第2期，2006年；第81-85頁。

³⁰ 參考饒鏜：〈天嘯樓藏書目序〉；見《饒鏜文集》之《天嘯樓集》卷一；（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1月；第22-25頁。

〈民國時期潮汕私人藏書述略〉介紹了四家藏書，以天嘯樓居首，然後再論及潮州謝元楷藏書室、揭陽姚梓芳秋園藏書樓、揭陽陳頡龍藏書室。³¹ 又如闕本旭〈潮汕歷代藏書樓述略〉中，首先詳細介紹了丁日昌持靜齋藏書和饒鏐天嘯樓藏書，然後羅列了晚至民國時期潮汕地區較著名的私家藏書樓（室）的名號：揭陽周子元二思樓、姚梓芳秋園藏書樓、吳文獻榕石園、孫振聲安樂居、吳汝霖人隱居、林德侯靜觀別墅、許元雄齋園、林清揚近韓居和陳頡龍藏書室；潮陽鄭邦任惜蘭香館；潮州林熙春城南書屋、謝元楷、曾師仲、王慕韓、柯曉山、蕭雙水等人的藏書室；澄海邱騰驤藏書室等等。他們的藏書少則數千冊，多則幾萬冊。³²

近年網上盛傳：「陳公梅湖也，其藏古籍書有十二萬餘冊……1949 年底大陸臨解放……饒宗頤……將陳梅湖韻古樓聞寒香室十二萬餘冊藏書運至饒宗頤住香港羅便臣道處。」這個說法完全是違反常識的，與史實嚴重不符。

所謂陳光烈（梅湖）的韻古樓聞寒香室藏書有二十萬卷十二萬冊，可能出於其後人的誇大或虛構。如果陳光烈（梅湖）的韻古樓藏書真的達到這個數量，它應該是全國排名前列的藏書樓，因為當時名滿天下的寧波天一閣藏書（亞洲三大私人藏書樓之一），也不過七、八萬冊而已，何以陳光烈（梅湖）的藏書當時竟在潮汕地區亦藉藉無聞呢？闕本旭〈潮汕歷代藏書樓述略〉一文所附載的〈潮汕地區書院藏書樓及私家藏書樓一覽表〉，詳盡羅列了宋代至民國時期潮汕地區公私藏書樓（室）117 家，其中並無陳光烈（梅湖）或韻古樓聞寒香室之名。³³ 因此筆者有理由相信，所謂韻古樓的藏書，縱使曾經存在，其藏書數量應不會超過數千冊，而質量亦必不入流，無甚特色。

日本侵華期間，饒先生天涯飄泊，已無餘力守護天嘯樓之藏書，連他父親饒鏐先生的眾多重要著述手稿，如《佛國記疏證》等等，皆一併漸次亡佚於戰火。故網上所謂饒先生於 1949 年把陳光烈（梅湖）的十二萬冊藏書由潮州運往香港羅便臣道，簡直是天方夜譚：如果饒先生當年的確有這能力，為何不先把自家父親留下的、質量俱佳的、名滿粵東的天嘯樓藏書運走呢？再者，1949 至 1952 年間，饒先生在香港生活緊絀，寄人籬下，先後居於上環永樂街偉聯行的辦事處閣樓上（與衛聚賢教授一起蝸居於此）和香港南北行的某閣樓小房間，絕非當時已屬香港傳統高尚住宅區的羅便臣道。這一點，香港潮汕社區中知道的人仍有很多。網上傳聞乃是一種惡意攻擊饒先生的謠言，於此又可見一斑。

網上又有謠言指「近年，饒宗頤將部分來之不義藏書無償送交香港大學馮平

³¹ 見《高校文獻信息研究》（季刊）第 10 卷第 2 期（總第 38 期），2003 年 6 月；第 61-62 頁。

³² 見《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22 卷第 2 期，2006 年；第 84 頁。

³³ 見《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22 卷第 2 期，2006 年；第 85 頁。

山圖書館館藏」。此說大謬。考陳光烈（梅湖）1958年在香港逝世前，的確曾以高價向港大馮平山圖書館出售過他收藏的若干種古籍刊本如明本《史記測議》等和抄本如陳氏五十年代所編修的《饒平縣志補訂》、《南澳縣志》等。這是港大校方經辦的，與饒先生無關；而這若干種書，現藏於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善本書庫，與饒先生或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的藏書，沒有絲毫關連。

饒先生並沒有捐贈過任何自己的藏書給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饒先生於2003年，將其五十年代起在香港、新加坡等地任教時購藏所得的全部藏書約四萬冊（其中線裝古籍七百餘種，共2,500冊左右），捐贈予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而饒先生所捐贈之書籍，全部收藏於該館內。

必須指出，在饒先生捐贈給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的書籍中，既無任何天嘯樓的藏書，亦無任何陳光烈（梅湖）所撰著述的手稿或曾經其收藏的書籍。其實，陳氏於逝世前一年，曾經自定一份所著書目清單〈梅叟所著書目〉，詳細列明了其所撰的56種著作手稿的收藏處，包括故里韻古樓、香港荃灣鷓巢（即陳氏香港居所）、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以及一些門生、故舊家中等等。³⁴此外，陳光烈（梅湖）大部分藏書的下落，其實也很清楚，有陳光烈（梅湖）孫子曾在網上發表過以下證詞：

（1951年）祖父（案即陳光烈）、伯父（即陳國香）在汕頭的家和祖父在大巷招撫第所珍藏的世代祖傳珍貴的文獻、文物、字畫、著作等均焚毀於一旦，一部分散落民間。據我和鄉民了解，押解人員夜晚冷了就燒古書籍、著作等取暖，好點的書稿紙就當卷煙紙吸到肚裏去了，著實可惜、可怕、可恨之。真是喪失理性，喪失人性，喪盡天良，慘絕人寰。

35

由此可見，陳光烈（梅湖）的著作手稿及其藏書的下落，皆與饒先生無關。而網上的指控，實屬無中生有、顛到黑白。

乙、饒宗頤先生的民族志節和操守

（一）抗日戰爭時期逃避倭寇和漢奸的逼害，以保存民族氣節

³⁴ 據〈祖父一生所著書目錄〉網帖；見陳公梅湖詩文文獻網。

³⁵ 據〈民國總統頒的牌坊怎麼不見了？〉網帖注文；見陳公梅湖詩文文獻網。

饒先生到底是怎樣渡過抗日戰爭時期的，這個課題一向未有人較詳細地研究過。因此，筆者做了一個初步的研究，據搜集史料所得，我們才知道，饒先生原來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是在不停地逃避戰火的艱辛中渡過的；這樣做是為了要遠離日本侵略者和一眾漢奸的統戰和統治。饒先生的這一段經歷，基本上是侵略者每到之處，他便設法逃離，走避後方的歷史。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但當時廣東地區尚未淪陷。饒先生其時在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中任藝文纂修，頗勤於著述，先後在《禹貢》等重要學術刊物上發表〈《海錄》筆受者之考證〉³⁶等論文，另有論文集《潮州叢著初編》³⁷等。1938年10月21日廣州淪陷，中山大學遷往雲南澄江。由於當時潮汕地區尚未落入敵寇之手，饒先生乃返回潮州，研究土著畚族³⁸。

1939年6月27日，日軍佔領潮安城。此前，饒先生已因中山大學中文系詹安泰教授的薦舉，被聘為中山大學的研究員。饒先生乃應聘前往，離開潮州，欲取道惠州，經香港，再轉越南，打算乘滇越鐵路至昆明；同行者有詹安泰先生（潮州饒平人）的夫人和女兒。途中，饒先生因染惡性瘧疾而滯留香港。這件事詹安泰先生的兒子、我國當代著名語言學家、廣州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詹伯慧先生在〈我所認識的饒宗頤教授〉一文中，已清楚提及，謂其母在戰後五十多年間經常念念不忘，感謝饒先生當年在走難途中對他母女二人的照料：

1938年中山大學因抗戰西遷雲南澄江，……父親（案：詹安泰）先期赴任，其後我母親與宗頤先生相約一道繞惠州經香港再轉安南（今越南）取道滇越鐵路上昆明。……50多年來，家母經常談起這段往事，迄今念念不忘當初蒙宗頤先生照料繞道赴港的情景。³⁹

此外，詹安泰先生亦有詩提到饒先生當時的經歷，〈寄贈饒固庵香港〉有句：

出處關天吾始信，蒼黃不染汝何賢。

下有夾注：

³⁶ 見《禹貢》半月刊（第7卷第10期）；（北平）禹貢學會，1937年7月；第33-35頁。

³⁷ 列為《廣州市立中山圖書館叢書》（3）；廣州市立中山圖書館，1938年初版。

³⁸ 王振澤：《饒宗頤先生學術年歷簡編》；（香港）藝苑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15頁。

³⁹ 見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編：《走近饒宗頤》；潮州市政府出版，2005年8月第1版；第35頁。

潮汕初陷時，聞敵方囑，固庵不為動。⁴⁰

據詩句和注文可知，日本侵略者當時曾企圖利誘饒先生，但他不為所動，此事當時已名聞士林。

饒先生避居香港時，曾協助王雲五先生編撰《中山大詞典》，又曾協助葉恭綽先生編訂《全清詞鈔》。⁴¹ 期間蝸居於狹小的房間，作〈斗室賦〉⁴² 以明志與抒懷，有「何烽燧之連延兮，悼百姓之震愆。……胡為乎莅此瓊島。……覲中興之目覩兮，又何怨夫為逋播之民。」等句，具見其民族感情與志節。1941年，因其祖母於鄉間逝世，作〈白雲賦〉。⁴³ 在香港即將淪陷之時，饒先生返回揭陽；此事有葉恭綽〈眼兒媚·送饒伯子歸里〉一詞為證：

笛聲吹斷念家山。去住兩都難。舉頭天外，愁煙慘霧，那是長安。 僊
都路阻同心遠，誰與解連環？鄉關何處？巢林瘁鳥，忍說知還？

程中山謂「此詞乃葉恭綽身處世積亂離之際，客中遠送饒生返回海陽故里」之作。⁴⁴ 案：饒先生當時並非返回已淪陷的潮州城（古名海陽），而是到潮汕人民的抗日後方揭陽。

1941年12月，日軍佔領香港。饒先生逃回潮州揭陽（當時揭陽是潮汕抗日的後方，並未淪陷），後在揭陽努力從事學術文化和教育工作。1942年，饒先生受堅決抗日的揭陽縣長陳暑木將軍聘任，為揭陽縣文獻委員會主任，主編地方文史刊物《文獻》創刊號（於1943年8月1日出版）。⁴⁵ 饒先生當時更被陳暑木將軍委任為揭陽民眾教育館副館長（正館長為石銘吾），主要任務是振興中華文化，並發揚潮州的文物和文化遺產，鞏固潮州人作為中華民族一分子的文化自尊心，並透過教育民眾，宣傳了抗戰的民族精神。據陳暑木後來的回憶：

⁴⁰ 見《鷓鴣巢詩集》卷第五；《詹安泰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第四冊之第101頁。

⁴¹ 王振澤：《饒宗頤先生學術年歷簡編》；（香港）藝苑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16頁。

⁴² 見《固庵文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9月臺1版；第13-14頁。

⁴³ 見《固庵文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9月臺1版；第15-16頁。

⁴⁴ 程中山：〈歷仕三朝葉恭綽〉；見（香港）《文匯報·香江詩話》；<http://www.wenweipo.com>；2005-01-28。

⁴⁵ 參考王振澤：《饒宗頤先生學術年歷簡編》；（香港）藝苑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18-19頁。有關陳暑木及揭陽縣文獻委員會，參考〈陳暑木任揭陽縣長的功過〉；見環球潮人網；<http://wh.hqcr.com/>；2012-03-30發佈。及揭陽縣文獻委員會出版之《文獻》創刊號；有潮汕歷史文化中心揭陽市研究會、揭陽市潮學雜誌社編輯部出版的複製版；2002年1月18日。

(1942 年秋)到揭陽之後，石銘吾、饒宗頤，束相依附，我乃委他倆為民教館正副館長，以振興中華文化，並發揚潮州的文物，曾經搜羅許多寶藏已久的歷史遺物，在縣政府舉行展覽會，且也發掘了許多藝人、匠人，以示潮州既有高度文化，潮人也有相當的天才，潮州人確不能妄自菲薄。⁴⁶

1943 年秋，揭陽局勢惡化，饒先生乃應聘為無錫國專（抗戰時遷至廣西）教授，奔赴桂林⁴⁷。1944 年，桂林告急，饒先生乃走入蒙山；蒙山淪陷，又避入大瑤山。⁴⁸ 其間饒先生幾乎被日軍戰機炸死。⁴⁹ 期間著有〈馬矢賦〉、〈囚城賦〉、〈燭賦〉、《僑山詩草》（附《北流集》）等抗戰文學作品。

抗戰勝利消息傳到蒙山之後，在當地避難的簡又文先生和饒先生等人欣喜若狂，饒先生有〈九月三日〉詩一首：

舉杯同祝中興日，甲午而來恨始平。一事令人堪管爾，樓船兼作受降城。

50

從上述饒先生抗戰時期的避難史，可以看出他作為一個中國傳統讀書人的民族氣節：寧可冒死逃難、顛沛流離、歷盡艱辛，也不願當侵略者和一眾漢奸的順民！關於在國難當前的時候，文弱書生可如何報效國家，有一位朋友說得很好：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文人的風骨當在國難、亂離之中突顯出來，歷代文人多有憂患詩篇，氣節成為評定詩人詩篇的一個道德準則。在民族存亡的危機關頭，文人手無縛雞之力，或選擇投筆從戎，或不願依附異族成為漢奸國賊而開始流亡生涯。抗日戰爭是中國歷史上一次規模最大的民族抗戰，在這個大是大非的關頭，……再看看簡又文、饒宗頤、梁羽

⁴⁶ 見陳暑木：〈饒宗頤與敦煌學〉（1983 年 12 月於泰國《新中原報》發表時，署名巽齋）；陳炎創、陳炎慧、陳炎芳編：《陳暑木詩文選編》（修訂本）；澳門文化廣場有限公司出版，2009 年修訂第二版；第 96 頁。

⁴⁷ 參考劉開基：〈五載寒窗四搬遷〉；見蘇州大學（原無錫國專）廣西校友會主編：《無錫國專在廣西》；不著出版者，1993 年；第 226 頁。

⁴⁸ 參考黃偉：〈閩、饒兩教授避難蒙山追憶〉及蕭德浩：〈1944 年無錫國專在蒙山的艱苦歲月〉；見蘇州大學（原無錫國專）廣西校友會主編：《無錫國專在廣西》；不著出版者，1993 年；第 234-238 頁。

⁴⁹ 參考鄭煒明：〈選堂先生軼事數則〉；見《紫禁城》2008 年第 9 期，總第 164 期；第 35-37 頁。

⁵⁰ 見《北流集》；蘇州大學（原無錫國專）廣西校友會主編：《無錫國專在廣西》；不著出版者，1993 年；第 282 頁。

生這些文弱文人當年不當亡國奴的英雄氣概，就知道中國歷史學者們也以自己的作為來為歷史記下一筆。還是白先勇說得好，中國人的抗日最慘烈，但也最頑強。⁵¹

綜上所述，我們可知，饒先生在抗日戰爭時期，一次又一次地投奔堅決抗日的、愛國的人士或學術組織，如葉恭綽先生、陳暑木將軍、無錫國專（廣西）等，在在顯示饒先生在大是大非面前，取態十分明確，他的民族精神和愛國情操是十分清楚的。

抗戰勝利後，饒先生受聘為廣東省立文理學院（今之華南師範大學）教授，又獲當時省主席宋子文聘為廣東省文獻委員會委員，又獲聘為廣東文物編印委員會委員。饒先生在抗戰勝利後，一再獲得省政府的聘任，已足證饒先生在抗日戰爭時期所表現出來的民族氣節，在當時已獲廣泛肯定。⁵²

近年有人在網上誣陷饒宗頤先生在抗日戰爭時期曾任潮汕「偽第五區秘書」，其意在污衊饒先生於日本侵華時期曾經當過漢奸或落水文人，影響極其惡劣。海內外已有一些當代著名學者，對真相如何，全不加考據，以信者恒信的態度，廣作二度傳播；如中國現代史某重量級學者、美國長春藤名校研究員陳某，即曾於澳門理工學院某國際研討會的茶聚中，信口雌黃，公然詆譏饒先生為落水文人（此乃筆者當時親耳所聞，山東大學的譚世寶教授、胡孝忠博士也在場）。事關吾師名節，必須嚴正澄清。筆者從此究心潮汕抗日戰爭時期史事，今對饒先生在這一段時期的經歷，勾稽如上，以正視聽。

（二）晚年倡論民族文化的復興

事實上，饒先生對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渴望，是源遠流長的。除了在眾多中華傳統文化的研究領域中，建樹良多之外，他在晚年更積極提倡復興中華民族文化，以鼓勵後學。例如他在 1994 年 2 月為自己所創辦、主編的大型學術刊物《華學》所撰的發刊辭就有這樣的說法：

⁵¹ 詳參孫立川：〈避難蒙山的文人們——饒宗頤、簡又文、梁羽生的一段難中軼事〉；見《文史春秋》；2006 年 02 期；第 17-19 頁。

⁵² 據檔案資料《廣東省文獻館籌備委員會名錄》、《廣東文獻館廣東文物編印委員會委員名錄》（1947 年 5 月 3 日）、《廣東省政府聘廣東文獻委員會副主任函》（1948 年 3 月 16 日）、《廣東省政府新聘文獻委員會委員聘函》（1948 年 3 月 26 日）、《廣東文獻委員會電知各委員任職期限》（1948 年 3 月 30 日）、《廣東文獻委員會新聘委員聘函》（1948 年 3 月 30 日）、《饒宗頤與葉玉甫主任委員來往信函》（1948 年 12 月）等。上述檔案俱藏於廣東省檔案館；照片見錄於廣州圖書館、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編：《萬古不磨意 中流自在心——饒宗頤教授學藝兼修展》圖冊；2007 年 4 月；第 10-12 頁。

從洋務運動以來，國人對自己的傳統文化已失去信心，外來的衝擊，使得許多知識分子不惜放棄本位文化，向外追馳騁，久已深深動搖了國本。「知彼」的工作還沒有做好，「知己」的功夫卻甘自拋擲。現在，應該是反求諸己、回頭是岸的時候了。⁵³

饒先生又在 2001 年 11 月 2 日，在北京大學的首屆「北大論壇」（亦即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論壇）的演講中，提出了應以創建新經學為工作目標，來完成預期中二十一世紀中華文化的復興。⁵⁴ 後於 2013 年 7 月 5 日，饒先生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中國夢當有文化作為〉一文，再一次宣揚新經學與我國文藝復興的密切關係，強調文藝復興運動，必須「發軔於對古典的重新發掘與認識，通過對古代文明的研究，為人類知識帶來極大的啟迪」，他並指出對古典並非照單全收，而應推陳出新，與現代接軌，並應給以新的詮釋。⁵⁵

從上舉三例，可以具見饒先生晚年非常強調民族文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他對復興中華民族文化的期望是殷切的，念茲在茲的。

縱觀饒先生一生，青年時繼承父親的遺志，由整理鄉邦文獻開始，漸次深入到國史研究的各個範疇；即使在抗日戰爭極度艱難的時期，他仍堅持恪守中華傳統文化之中士子學人的志節，貫徹始終地以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為己任；到了晚年，饒先生仍賈其餘勇，為積極推動中華文化的復興而努力。饒先生堪作現當代知識分子的典範。

從上述各方面的例子，我們已可清楚看到，饒宗頤先生的民族大義和對中華文化的忠愛。他深具氣節和風骨，這是一位學者、文人在人品方面最重要的一環。而饒先生今年已虛齡九十九歲了，他在這方面畢生的表現，已可定論：他是很值得我們尊敬的。

丙、饒宗頤先生的學術舉隅

⁵³ 見《華學》（第一期）；（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 年 8 月第 1 版；首頁。

⁵⁴ 演講辭題為〈預期的文藝復興工作〉；收錄於「北大論壇」論文集編委會編：《21 世紀：人文與社會——首屆「北大論壇」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9 月；第 25-30 頁。後經修訂並改篇題為〈新經學的提出——預期的文藝復興工作〉，收錄於《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卷四·經術、禮樂）；（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3 年 10 月初版；第 7-12 頁。案：此文撰於二十一世紀初，卻唯一被破例收入《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中，可見饒先生對此文的特別重視。

⁵⁵ 此文由筆者據饒先生舊文撮要改寫，經饒先生審定。另有中國新聞社網上版。

饒宗頤先生從事學術工作，至今已超過 80 年，以為人正派，學風嚴謹見稱，曾經歷國際學術界的長期考驗，一向備受尊崇。饒先生的學術，格局恢宏，方面廣博，在許多領域都具有開創性的研究成果，質量兼優，足以啟迪後學。茲舉手頭資料，略加論述，以窺饒先生個人的學術史及其學風之一斑：

（一）饒宗頤先生補訂其父饒鏗先生未完成的《潮州藝文志》遺稿

考今已刊行的饒氏《潮州藝文志》，署「潮安饒鏗鈍齋輯、長男宗頤補訂」；最早於 1935 年至 1937 年刊於廣州私立嶺南大學的《嶺南學報》第四卷第四期至第六卷第三期；後又於 1994 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重印本；2003 年收入《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卷九·潮學）。饒鏗先生原編初訂為 23 卷，但他只編定了前 16 卷而已，內容至明代而止。饒宗頤先生後重為補訂，改編為 20 卷（17 卷正文、外編、訂譌、存疑各 1 卷，共 20 卷）。今已刊諸本之正文僅 13 卷及饒先生後來補訂之別卷 1 卷。我們可經常見到在饒鏗先生所撰的許多條目內容之後，會有饒先生的案語和補述資料；有關諸條皆有「宗頤案」及「補」等字樣為識別標記，具見饒先生早年學術工作的真迹。

從饒氏《潮州藝文志》的成書過程看來，其實可視為父子二人合著。而饒先生自我定位為「補訂」，而他所親撰的內容又清楚標識為「宗頤案」和「補」兩種，明顯沒有掠美其父饒鏗先生之意。至於饒鏗先生撰輯《潮州藝文志》，約始於 1923 年；據鄭國藩於民國二十一年（1932）所撰的〈饒君純鈞墓志銘〉：

饒君純鈞……近十年來，留心鄉邦文獻，擬編《潮州藝文志》，自明以上皆脫稿，有清一代，僅定書目，而君已病矣。疾篤時，予與吳君子筠臨視，君無他語，惟惓惓以是書未成為憾。⁵⁶

饒鏗先生卒於 1932 年，故知他約於 1923 年左右已開始從事《潮州藝文志》的撰輯工作。饒鏗先生著手撰輯《潮州藝文志》一事，當時潮州文壇名流知之者甚眾，如鄭國藩、楊光祖、黃仲琴等耆宿名流，多有撰文述及。如鄭國藩所撰〈天嘯樓集序〉：

饒君純鈞……長於考據，著述甚富，《潮州藝文志》一書，尤其殫極精力而為之者，書未成而君病以死。⁵⁷

又如楊光祖所撰〈天嘯樓集序〉：

⁵⁶ 見《饒鏗文集》；（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10 年 1 月；第 153-155 頁。

⁵⁷ 見《饒鏗文集》；（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10 年 1 月；第 3 頁。

饒君純鈞……其所撰著《潮州藝文誌》既未成書，……蓋汲汲於沒世之名，將以其身之勤而為之者也。……此《藝文志》之所以未能完稿，而予所以序其文而不禁為之歎歎歎惋也。⁵⁸

又如民國廣東著名學者黃仲琴於 1934 年所撰之〈潮州藝文志序〉：

得讀先生《潮州藝文志》稿，嘆為盛舉，惜未終篇。宗頤學有淵源，實吾畏友。年僅十八，續成父書。⁵⁹

可見饒先生續成父親遺著，當時已是佳話。而饒鏗先生的輩路藍縷，更廣為時流所稱頌。

至於近年始發現的一種署款「大埔溫廷敬纂錄」的《潮州藝文志》，為未刊鈔本，原稿謂有 8 卷，現存 7 卷，今藏於汕頭圖書館。筆者因尚未寓目，故其內容如何，尚待考核。《潮州藝文志》屬地方文獻目錄學一類的著作，因此二書內容或有相近之處，不足為怪；但二書篇幅詳略不一，其用力之不同，則已是顯而易見的。筆者估計溫廷敬先生當年或亦曾擬纂錄《潮州藝文志》，或因書未完稿而饒志已刊行，故爾擱置，書稿亦未嘗付梓，最終入藏汕頭圖書館，亦未可知，待考。

（二）關於饒宗頤先生的敦煌學研究

饒先生的敦煌學，成名於上世紀五十年代中，主要成果有：道教專著《敦煌六朝寫本張天師道陵著·老子想爾注校箋》（1956）⁶⁰，這是世人研究敦煌本《老子想爾注》的第一部專著。另有目錄學論文〈京都藤井氏有鄰館藏敦煌殘卷紀略〉（1957）、文選學論文〈敦煌本《文選》輯證〉（一）及（二）（1957、1958）等。

至六七十年代，饒先生敦煌學的研究重點，主要放在敦煌曲子詞、敦煌琵琶譜、敦煌舞譜、敦煌白畫、敦煌寫卷的書法、宗教類的敦煌經卷、唐前文學作品的敦煌本子、敦煌歷史等方面。在這些領域，他都有重要著作和論文的出版和發表，如《敦煌曲》（1971）、《敦煌白畫》（1978）等專著，〈敦煌琵琶譜讀記〉（1960）、〈敦煌舞譜校記〉（1962）、〈敦煌寫卷之書法〉（1965）、〈論敦煌陷於吐蕃之年代

⁵⁸ 見《饒鏗文集》；（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1月；第7-8頁。

⁵⁹ 見《饒宗頤二十世紀文集》卷九，潮學（上）；（台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10月初版；第13冊，第243頁。

⁶⁰ 列作《選堂叢書》（2）；（香港）東南書局；1956年4月初版。後有增訂本，書名改為《老子想爾注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1月。

——依《頓悟大乘正理法》考證》(1971)、《曲子《定西蕃》——敦煌曲拾補之一》(1973)、《孝順觀念與敦煌佛曲》(1974)、《論敦煌殘本《登真隱訣》(P.2732)》(1965)等等，都是相關課題的學術研究史上的先行者。

八九十年代以來，饒先生在敦煌學方面繼續有多種重要著作和論文發表，並積極參與和組織有關敦煌學的學術活動和研究項目，如創辦香港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期間提攜內地敦煌學界後進，不遺餘力。2006年饒先生口述，由筆者助撰寫成《敦煌學應擴大研究範圍》一文⁶¹，明確提倡廣義的敦煌學，認為敦煌學的研究範圍，年代可上推至秦漢，內容則除經卷文獻和石窟圖像外，還須研究簡牘和石刻史料等，對敦煌學界貢獻極大。以上各方面可資參考的資料極多，於茲不贅；詳參筆者所編《饒宗頤教授著作目錄新編》⁶²、拙著《記饒宗頤先生九五華誕研討會——兼略述饒氏敦煌學成就》⁶³及羅慧《饒宗頤教授與香港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⁶⁴等書文。

饒先生敦煌學的特色，是以研究英法所藏敦煌經卷為主，結合文獻，作出種種考證，從而得出許多成果。上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饒先生先後在香港、日本、新加坡、法國、美國、台灣和印度等地任教或從事研究工作，與歐美日漢學界有較密切的交流，能較方便地接觸到法英美日等地所藏的敦煌經卷，也因此造就了他以研究海外所藏敦煌卷子為主的敦煌學特色。由此可見，要在敦煌文獻學方面有大成就，也不一定要長居敦煌的。網上有譏諷饒先生的言論謂其敦煌學的主要著作，乃抄襲自敦煌一位不知名的中學老師的未刊稿。此說荒謬絕倫，蓋於上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國內地閉關自守，一位中學老師如何可往英法等地檢閱英藏、法藏敦煌經卷？遑論研究！饒先生當時生活於香港，的確比較幸運，他有機會遠赴英法美日等國從事相關的研究。

不過，饒先生甚少研究敦煌洞窟中的壁畫，據考僅有論文《劉薩訶事跡與瑞像圖》(發表於1987)、《The Vedas and the Murals of Dunhuang》(1989；筆者當時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任饒先生的研究助理，曾協助撰譯此文)等；前者涉及敦煌石窟圖像考古，後者涉及印度婆羅門教的圍陀學，皆屬很專門的課

⁶¹ 見《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九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5月第1版，第1-5頁。又見鄭煒明主編：《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十周年館慶同人論文集·敦煌學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9月第1版；第1-7頁。

⁶² 鄭煒明、林愷欣編：《饒宗頤教授著作目錄新編》；(濟南)齊魯書社；2011年8月第1版。

⁶³ 見《明報月刊》；香港，2010年10月號，第63-66頁。又見鄭煒明主編：《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十周年館慶同人論文集·敦煌學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9月第1版；第414-420頁。

⁶⁴ 見鄭煒明主編：《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十周年館慶同人論文集·敦煌學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9月第1版；第388-409頁。

題。

順便在這裏澄清一點，有人以為法國法蘭西學院 1962 年頒授給饒先生的漢學儒林特賞（俗稱儒蓮獎），是因為他在敦煌學方面的貢獻，其實不然。該獎當年頒給饒先生，主要是為了肯定和表揚饒先生在甲骨學和殷商史方面的貢獻，尤其是他 1959 年 11 月在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這一部重要著作，當時西方漢學界共有十多個國家的學者曾為此書撰寫了予以肯定和推介的書評。筆者異日當撰文詳述此事始末。

（三）關於饒宗頤先生的李鄭屋村古墓研究

九龍李鄭屋村古墓，1955 年 8 月 9 日發現（乃香港首次發現的中國古墓），隨即由香港大學中文系林仰山教授主持發掘，饒先生當時乃中文系講師，他在 8 月 11 日已與港大的同事簡又文先生一起進入了古墓的考古現場，有關詳情可參考林仰山教授當年的考古簡報。⁶⁵ 其後，饒先生在香港大會堂為考古學會作公開演講，已初步發表其後來專業論文內的觀點。1965 年，饒先生在日本大阪大學史學會再作演講。而羅香林先生亦於同年發表〈李鄭屋村與香港地區自漢至清初的沿革〉⁶⁶ 一文。至 1969 年 1 月饒先生才在台灣中研院史語所集刊上書面發表其論文《李鄭屋村古墓磚文考釋》⁶⁷。饒先生以古墓中磚文「薛師」二字之形體和書法，與《修堯廟碑》、《咸陽靈臺碑》等東漢碑刻字體相近，作為斷代的有效佐證，因此，他將古墓定為東漢時期墓葬；而「薛師」乃造磚匠的題名。至於磚文中又有「大吉番禺」和「番禺大治曆」，饒先生認為「大吉」和「大治曆」都是吉祥語，「磚文之『治曆』與『艾歷』『裔歷』，可能是同語異文，俱古聯綿字，為漢代之成語。」饒先生據《說文》、《爾雅釋詁》、《周書謚法》、《方言》、《小爾雅》等，以艾歷、裔歷皆可訓為相，「『相』又訓『治』，則『番禺大艾歷』，猶言『番禺大治』」。關於李鄭屋漢墓的研究，饒先生於 2005 年在筆者的助撰底下，又發表了〈由磚文談東漢三國的「番禺」〉一文，內容旁及東漢年代廣東地區的士氏家族、番禺鹽官、南投司鹽都尉及深圳南投紅花園「乘法口訣」磚墓主身分等⁶⁸，具見先生對一個學術問題的長期關注與輻射式的研究視野。

⁶⁵ Prof. F. S. Drake (林仰山教授) (1892-1974): On the Excavation of an Ancient Tomb East of the Li Cheng Uk (李鄭屋) Resettlement Area, at the End of Tonkin Street, Sham Shui Po (August 9th – 13th, 1955); 見香港歷史博物館編製，《李鄭屋漢墓》，2005 年；第 61-70 頁。案：此間報最早見載於香港政府出版的 1955 年度《香港年報》(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55) 第十章。

⁶⁶ 見《慶祝李濟先生七十歲論文集》上冊；(臺北) 清華學報社，1965 年 9 月；第 75-92 頁。

⁶⁷ 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39 本上冊)《慶祝李方桂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臺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9 年 1 月；第 41-44 頁。

⁶⁸ 見香港歷史博物館編製，《李鄭屋漢墓》，2005 年；第 8-11 頁。

在饒先生 1969 年發表他的論文之後，影響極大。其後有屈志仁先生的《李鄭屋漢墓》⁶⁹ 一書和羅香林先生的〈香港李鄭屋村漢墓之發現與出土文物〉⁷⁰ 一文(案:此文變相是一份相對完整詳細的考古報告)，大抵與饒先生的學術觀點大同小異，於茲不贅。

網上有譏謗說饒先生的這篇論文，脫胎自陳光烈（梅湖）的一篇《漫談九龍李鄭屋村古冢》的未刊雜文⁷¹，此說大謬。陳氏並沒有親睹遺址發掘現場，他的《漫談》，只是在當時根據香港各大報章廣泛的報道而寫成，而且論點及引證皆謬誤屢出。例如他說「據史志記載，此塚地實於番禺無關」，這個誤判，實由於未能詳檢史志記載而致。又如說「番禺大治曆」的大治或為道曆，從而臆論墓主乃一位大道士等，十分荒謬可笑。總之，陳氏此文與饒先生的學術論文，性質和內容皆有重大差異，更非在同一水平上，根本不可混為一談。

（四）關於饒宗頤先生的《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

饒宗頤先生的《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中國史學觀念探討之一》⁷² 自出版以來，廣為史學界推崇。如復旦大學著名史學史專家朱維錚先生為這本書再版作序時所說的：

就寡聞所及，國內近數十年專究歷史觀念史的論著本就稀見，而以正統論為題進行全面系統考察的專著更未發現。我所見而又是同行公認的力作者，唯饒先生這一部。⁷³

又如侯德仁在〈近三十年來的中國史學正統論研究綜述〉一文中亦謂：

應該指出，饒宗頤先生的這部著作仍然是迄今為止對正統論研究最為全面的一部著作，當推為首位，頗具權威性。⁷⁴

⁶⁹ 香港市政局，1970 年。

⁷⁰ 見《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 37、38 期合刊（1971 年 11 月）；1975 年 6 月出版；第 69-100 頁。

⁷¹ 見陳端度近年創立的「陳公梅湖詩文文獻網」。

⁷² （香港）龍門書店，1977 年 9 月初版。

⁷³ 朱維錚：〈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序〉；見饒宗頤著，《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年 8 月第 1 版；第 5 頁。

⁷⁴ 見《蘭州學刊》2009 年第 7 期，總第 190 期；第 203 頁。

另有謝貴安〈饒宗頤對史學正統論研究的學術貢獻——《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發微〉一文⁷⁵，可參考。

早於饒宗頤先生《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出版前約一年，他在香港大學任教時期的學生趙令揚教授，也出版了所著的《關於歷代正統問題之爭論》⁷⁶一書。趙書刊行於1976年，而饒先生的著作，出版於數月之後；饒先生在《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後記》中，對趙書早於己書之刊行，表示「深喜致力之相同，尤忻其先我著鞭」，接著對趙書有所評論：(1) 謂趙書並非全面探討；(2) 謂趙書考正統論之起源失實；(3) 謂趙對正統論之理解有所缺失；(4) 謂己書網羅輯錄資料較趙書豐富詳盡，且每於輯錄之資料下著有按語，以微言隱義。⁷⁷ 經檢視二書，細加比勘後，筆者認為饒先生的著作乃一部出版在趙書之後，但內容比趙書更為充實和準確的著述。事實上，饒先生的著作16開本共397頁，而趙書則為32開本共176頁。因此，饒先生的著作，是在學術上超越了趙書。學術界常言後出益精，饒先生此著不失為一個上佳的例證。

(五) 饒宗頤先生的歷史文化散文《南澳：台海與大陸間的跳板》

饒先生的《南澳：台海與大陸間的跳板》，最早為提交1994年8月南澳「海上絲綢之路」研討會的文章，後發表於1994年9月的香港《明報月刊》總第345期上⁷⁸；此文為一篇短篇的文化散文，內容由潮汕新石器時代，談到清初順治康熙時的南澳和後來十七八世紀中外交流習見的工藝品祝壽屏風等。

在同一個「海上絲綢之路」研討會上，馬楚堅博士也發表了他的長篇史學論文《南澳之交通地位及其於明代海防線上轉變為走私寇攘跳板之發展》⁷⁹。這篇論文除了篇名巧合地同樣用上了「跳板」一詞之外，其性質和內容皆與饒先生的散文不同。馬氏的論文以直接史料為主，集中討論明代的海防、走私和海盜之間互為因果等關係問題。它是一篇極專門的學術論文，與饒先生的文化散文沒有可比性。

順帶一提的是，以「跳板」這個意象來談論南澳歷史和文化問題的情況，並不罕見。研究抗日戰爭史的學者，就普遍認為日本侵略者利用南澳作為侵佔潮汕

⁷⁵ 見《史學理論研究》2005年第2期；第23-33頁。

⁷⁶ (香港)學津出版社，1976年5月初版。

⁷⁷ (香港)龍門書店，1977年9月初版；參第384頁。

⁷⁸ 見第110-111頁。

⁷⁹ 見馬楚堅著：《明清人物史事論析》；(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445-487頁。

地區以至華南的「跳板」。

近年有人在網上謠傳一些所謂直接引用馬氏的言論，謂饒先生此文乃剽竊自馬氏論文，此說完全是無中生有的。據筆者所知，馬楚堅教授從未說過網上所謠傳的那些話；馬教授並已在律師處作公證聲明，否定有關的謠言。

學術著作的抄襲剽竊，是對一名學者最嚴重的指控。饒宗頤先生乃當代最重要的學者之一，如果網上的所謂「嚴肅指控」、其所捏造的所謂證據能夠成立的話，則饒宗頤先生當早已在香港乃至於國際學術界中除名，為何至今我國和國際學術界對他仍是尊崇備至，榮譽日增？須知饒先生經過七八十年的檢驗，其高尚的學術道德，在學術界已有公論；饒先生堪稱我國文史學界的一代大師。事實上，網上的所有指控，全屬造謠謾罵，至今沒有拿出過一條真憑實據來。我們相信，這些惡意中傷，是一種以栽贓嫁禍的手段，作出誣告，企圖攻擊學術文化界的大師，來達到一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餘論

友人謂網上謠言眾多，莫衷一是，不信者恒不信，故不必認真看待。對於這個觀點，筆者實未敢苟同，尤其是考慮到將來學術史書寫時角度的問題，更覺不得不慎重處理。即以饒宗頤先生被人惡意中傷一事為例，海內外已有一些當代著名學者，對真相如何，全然不加考證，以信者恒信的態度，廣作二度傳播，影響極壞；例如某重量級中國現代史學者、美國某長春藤名校的研究員陳某（此人於澳門理工學院某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信口雌黃，月旦饒先生為落水文人，乃筆者親歷其境之事，有山東大學譚世寶教授和胡孝忠博士等學者可作證人）等等。長此下去，試問將來有關這一段的學術文化史可以怎樣寫？今日筆者不得已作出考辯，不過是為他日史家儲備史料而已。須知道我國史學界常有「去古未遠（或時代相近），其說必有所據」這一類推論邏輯的習慣。那麼百年之後或許有歷史學家也會用這一種邏輯，引用今天的網上「文獻」來評論今人的種種是非功過；據聞網上造謠中傷饒先生的這種「文獻」，已被附刊於陳梅湖的各種著作之中。如果我們今天在能力所及的情況下，對謠言不予以嚴正批駁的話，今天的謠言就可能變成將來的信史文獻了。個人認為，作為文史學者，我們有責任公平、公正地做好當代史。

後記

近年饒宗頤先生被某自稱陳梅湖（即陳光烈，抗戰時期潮汕三大漢奸之一）孫子的網痞不斷

地生事滋擾，砌辭誣陷；其捏造事實，蠱惑人心，迷惑了許多不知底蘊的人，令眾多信任饒先生人品學術的朋友深感不平。適逢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主辦饒學研討會，為了捍衛一代大儒的清譽，為世間存一點正氣，以略盡一個學者和弟子的本份，筆者不得已考述以上三數事，祈能廓清真相，以報求真、求是、求正的知音。

2014年10月30日凌晨三時初稿於蠓鏡蝸居

2015年3月3日零時11分修訂完稿